



改訂論

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研究

靳明全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PD

前 言

再过五年，廿世纪将成为人类的历史。

廿世纪初期，中日两国历史上都有一页重要的记录，那就是，中国各界人物纷纷赴日留学。学成归国后，昔日的东洋留学生有很多成为了中国近现当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廿世纪初期至中叶，中国的文坛、政坛、军界，乃至经济科技领域，赫赫有名于世者，大多是廿世纪初期赴日留学生。横跨着中国现当代史，茫茫空间，叩动着廿世纪末无数今人心弦的，也多是这批赴日留学生。请看：

叱咤文坛的：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吴虞、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穆木天、成仿吾、刘呐鸥、李叔同、曾孝谷、陈大悲、徐半梅、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胡风、周扬……

左右政坛的：汪兆铭、宋教仁、廖仲恺、黄兴、秋瑾、朱执信、戴季陶、张继、居正、吴稚晖、胡汉民、张群、周佛海、汤尔和、张君勱、邵力子、周恩来、吴玉章、沈均儒、林柏渠、董必武、施存统、彭湃、李达、李汉俊、邹鲁、汤化龙、刘师培、陶成章……

支撑军界的：蒋介石、何应钦、阎锡山、程潜、杨杰、汤恩伯、盛世才、陈铭枢、蒋方震、吴禄贞、蓝天蔚、李烈钧、蔡锷、尹昌衡、孙传芳、唐继尧、徐树铮、何成凌、周逸群……

活跃经济科技界的：孔祥熙、刘揆一、张嘉森、金邦平、钱新之、李焯尘、吴鼎昌、杜重远、李铭、周作民、包达三、范旭东、康心如、谈荔孙、陈朵如、杨培贤、曹汝霖、陆守舆、章宗祥、张连科、王学文、李四光、钟观光、陈嵘、丁颖……

上述人物，有的还是所谓“两栖”者，既支配政坛，又主宰军界，既叱咤文坛，又活跃经济科技界。有的甚至横跨各界，涉足四方，左右着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当时中国社会的重大运动几乎都是由这些人发起和指导。这些人有一个十分醒目的标志，就是廿世纪初期赴日留学。这就涉及到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们留学日本，向日本学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在日本所受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他们归国后的行动和思想的呢？他们归国后的重要成就中到底有哪些“日本影响”的因素呢？这些，正是笔者考察和研究的重点，也是至今中日社科界未攻克的一项重大科研工程。

任何一项历史性的运动都是由当时的著名人物发起和指导的，这些著名人物自身的文化素质是他们发起指导的历史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廿世纪初期至1931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运动也不例外。曾赴日留学归国的著名人物，发起指导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运动，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是支配当时中国历史运动如何发展的重要因素。考察这些著名人物自身的文化素质（即考察这些著名人物确立的文化知识结构），无论如何，不能回避他们留学日本的历史。并且，这些人物确立文化知识结构的最佳年龄之际，正在日本留学。廿世纪初期赴日留学归来的著名者，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所起的作用说明：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受到日本的较大影响，即使那时中国接受了西方社会和俄国的影响，日本这个“中介”的作用也是重要的。所以，中国大陆、台港出版的有关史学书和专著，均应如实写出中国社会这个阶段的“日本影响”，才符合历史事实。

笔者在占有大量的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拟写以下四部专著（共100余万字）来阐述这个观点。

A、攻玉论——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研究。

B、攻玉论——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政治人物赴日留学的研究。

C、攻玉论——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军事人物赴日留学的研究。

D、攻玉论——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科技人才赴日留学的研究。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A著《攻玉论——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研究》。

廿世纪初期至1931年，叱咤中国文坛的是曾赴日留学的文人，他们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了先驱者的伟大作用。

（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二）从创造社到中国新感觉派。

（三）中国话剧的兴起和发展。

（四）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上述四个方面，就像四个侧面，构建起了中国文坛的重要框架，赴日留学归来的中国文人的伟绩，构建成了当时中国文坛的重要内容。舍此，则无中国现代文学史。赴日留学归来的中国文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文化活动也借鉴了日本，其伟绩还透露出他们曾接受的日本文化因素。笔者在本著中重点考察论述了这个问题。篇幅约占本著的一半，此乃第四章“日本影响”——中国文人归国后的重要成就考察。这是本著的要点。愿与读者共同“攻关”，哪怕在少许问题上达到共识，笔者也不胜欣慰。

任何一项历史性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研究，笔者自然要考察中国文人

赴日留学的时代背景。廿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处于动荡不安的多灾多难的时代，特别是国民文化素质急剧陡降，令中国有识之士饱怀着忧患意识。可是，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的光泽之下，国民文化素质大大地提高。为拯救祖国、民族于危难之中，中国文人赴日“攻玉”，已成时髦。无论是新文化的启蒙者，或是浪漫派文人，无论是戏剧文人，或是左翼文人，赴东瀛“攻玉”是他们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壮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文化富有的开放精神、进取精神，日本文化的危机感、超越意识，日本文化的认真态度、求实精神，日本文化的“人情美”、“物の哀れ”，像大旱之甘雨，似应时之好雪，沐浴着这些赴日的中国文人。追本穷源，笔者在本著的第一、第二、第三章中不吝笔墨仔细考察了这些“攻玉”过程。

关于廿世纪初期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研究，笔者重点考察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留学生接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史实，目的在于：不仅仅是部分解决当今赴日留学之弊端；也不仅仅是为21世纪的中日邦交提供一些史鉴；重要的是，廿世纪末对此进行反思，反省廿世纪末的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依然较低的现象，反观当今日本国民文化素质提高的景况，在较大的反差之中，强化中国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像鲁迅那样，坚持不懈地改造中国国民性弱点，努力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实现中国国民以“文化伟人”的整体形象屹立于世的宏愿。这，正是本著的余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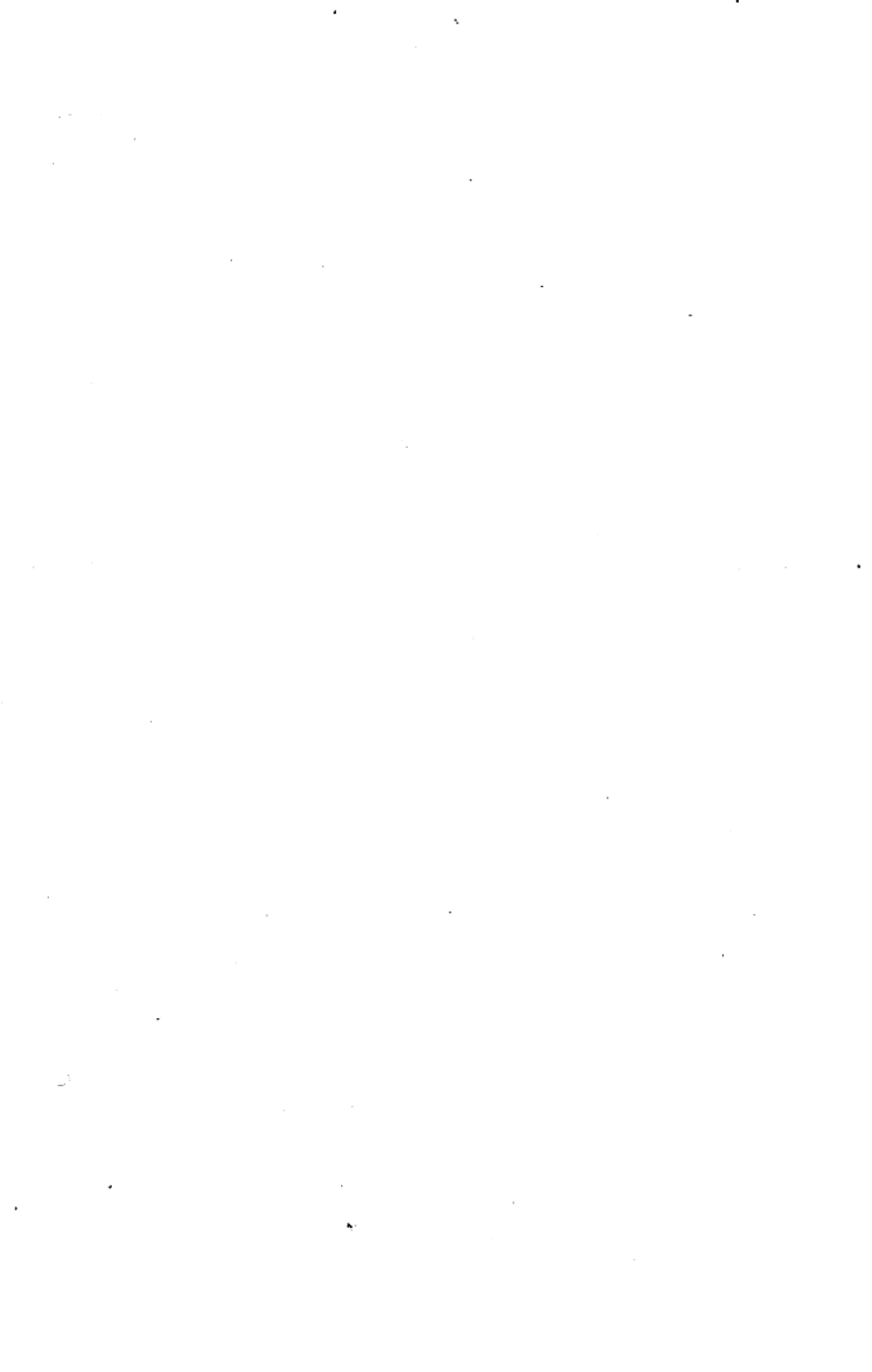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时代背景	
第一节 清国的没落——国民文化素质的陡降	(3)
第二节 日本的崛起——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15)
第三节 中国有识之士的思考	(26)
第四节 中国文人赴日留学的原因及特征	(43)
第二章 中国文人赴日攻玉	
第一节 新文化启蒙者赴日	(55)
第二节 浪漫派文人赴日	(69)
第三节 戏剧文人赴日	(85)
第四节 左翼文人赴日	(99)
第三章 日本文化：攻玉之石	
第一节 开放精神 进取精神	(119)
第二节 危机感 超越意识	(132)
第三节 认真态度 求实精神	(141)
第四节 “人情美” “物の哀れ”	(149)

第四章	“日本影响”——中国文人归国后的 重要成就考察	
第一节	观照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61)
第二节	观照二：从创造社到中国新感觉派	(194)
第三节	观照三：中国话剧的兴起和发展	(236)
第四节	观照四：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和 发展	(280)
第五章	余论	
	廿世纪末的反思	(329)
	主要参考书目	(337)
	附 录：	
	日中科学人材交流百年史的教训	园田信行 (341)
	后 记	(355)

第一章

时代背景



第一节 清国的没落

——国民文化素质的陡降

一、清国的没落

1840年，西方许多国家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已有了二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可是，当时的满清统治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整整落后英国两个世纪。

1840年，英国使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1840年到1900年，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战争结果均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最后被迫接受列强的城下之盟，签订屈辱的条约。清朝走向没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败的结果，中国丧失了大量的国土，还得支付巨额的赔款。支付赔款，造成财政的亏空，为此，清朝政府大借外债，以支付赔款。为了偿还外债，清朝政府向各省摊派贡纳。各省政府以各种名目增加捐税，终究是向人民敲骨吸髓，大肆搜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个叫曹志清的官员在其奏折中对直隶省的差徭

情形作了供述：“直隶省差徭之繁重，甲于天下。常年杂差，民力已苦不支；去岁兵差络绎，州县横敛暴征，而民不堪命矣！……无如不肖州县，藉差为肥私之计，胥役视差为致富之门，敲骨吸髓，毫无顾忌。勒派之法不一：有按牛马捐者，有按牌户捐者，有按村庄捐者。明以要车为名，其实全行折价，一马一牛，折钱百串及数十串不等，下至一驴，亦折十数串。一牌一户，捐钱数十串及七八串不等，甚至无衣无褐之户，亦捐钱一两串。其按村庄捐者，过三百户为大村，捐钱二千串及一千串，三百户以下为小村，捐钱七八百串及五六百串，甚至数十户之村，亦捐钱至二三百串。……差役四出，虎噬狼贪，惨难言状！少不遂意，立加拘此。……尤可骇者，去秋水灾，哀鸿遍野，……仍向民间苛派，……至转于沟壑，无所控告！”^①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方文书中也承认清国没落后的黑暗现实：“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②

屈服列强，丧地赔款，经济落后，财政亏空，贪官污吏，卑劣鄙陋，军备废弛，扰民劫财，民力凋敝，民不堪命，这就是清政府统治的中国没落的社会状况。

二、国民文化素质陡降现象

社会衰落，伴随着的是国民文化素质的陡降。清国没落后，国民文化素质就存在着以下颓势：

一 保守，调和，折中。保守主义是晚清执政的士大夫作为道

^① 《光绪朝东华录》。

^② 《光绪朝东华录》。

德的考虑为依归，而道德的考虑实质上是以封建主义道德标准要求做人的价值。“天不变道亦不变”，恪守古训古法，缺乏竞争意识。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革新意识均要在传统道德面前鞭撻，最后不是流产就是搁置拖延。调和、折中是晚清掌权的士大夫实践《中庸》的道德标准。其要点是崇尚事物保持封闭式的和谐平衡，不走极端，反对事物的根本变革。“保守、调和、折中”虽然较集中表现在执政的士大夫身上，但是，它却体现了晚清国民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少有进取冒险之义举。

——迷信。盛行算命、风水、手相、卜卦、求神拜佛等，实质上是崇尚天意、屈从天命，将人世间的灾异视为上天作为显示人间君主的祸福的预兆，进而产生盲目迷信，在人们心灵中造成愚昧与无知，缺乏对科学的认识，无学术之更新，无个人自由之可行。正如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文中所说的：“民族的一切傲慢和偏见，蠢笨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集于一身。迷信作为晚清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缺乏科学。

——惰性。鲁迅对国民的惰性深恶痛绝，他曾说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① 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惰性表现是听天任命和中庸，鲁迅认为，中国人惰性的实质是“卑怯”，“无往而不合于圣道。”^② 中国传统观念是讲“命”轻“力”，讲“勿”轻“为”。缺乏冒险进取精神，造成晚清社会一种非民族功利主义，使国民文化素质表现出“有暮气而无朝气”，沉于惰性，而乏探索。

——麻木。麻木作为晚清国民文化素质的表现就是精神上极度的空虚和无聊，不能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甚至忘记自己的痛苦，对人生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恰如鲁迅所贬斥的“看客式的无

①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② 鲁迅《通讯》16。

聊”：“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猥亵，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①

——奴性。奴性指国民落后的奴隶性格，指人没有正当的权利，人的主体精神受到了抑制，不能自由思考，成为愚昧、落后而不能自觉的工具，这也是晚清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表现之一。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落后的奴隶性格，表现为国人坠入“天行之奴隶”，“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情欲之奴隶”。^② 这四种奴隶性格是由于国人缺乏个性自由而产生的。缺乏个性自由的要点是心灵中的奴隶性，人的主体精神受到束缚、桎梏，存在着甘当奴隶的思想：“人之奴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③ 国人的奴性与封建蒙昧主义互为表里。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文化统制政策，销毁、篡改古籍，大兴文字狱，培养了大批的唯唯诺诺、唯上是听、安于命运的奴才。鲁迅认为，这就是中国人“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④

——贪污。清末吏治的腐败主要是贪污。晚清政府国库渐空，而需用浩繁，就实行“捐纳”制度，把卖官鬻爵当作政府额外收入。结果官场中有很多人以金钱而得官职。既以钱买来官，上了任他们就狼如虎地搜刮，一本万利地索回，造成大量的贪污腐化。晚清官场，京官形式上是仅靠俸饷，而地方官则可明目张胆地捞油水，所以，京官偶遇外差，自必拼命搜刮。地方官为得内廷照应，又必将部分搜刮孝敬上司和京官。大小京官仰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①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②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

③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

④ 鲁迅《买〈小学大全〉记》。

已成惯例。晚清高级官员在职时间往往几年，而下级官员（胥吏）往往在职终身，但这些胥吏社会地位低下，薪金微薄，为维持生计，伺奉上司，他们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就无度地向百姓索取，贪污贿赂成风。晚清官场吃空缺现象严重，军队尤甚，竟有十营不满五营之额，八营不足三营之数。军官贪污，克扣军饷，士兵每人月饷四两，常常仅发二两之事司空见惯。贪污是清朝普遍性的官场现象。如乾隆皇帝时的一位大臣和坤，贪污的财产达一亿二千万两。晚清大臣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上行下效，清国官场风行贪污，人人趋之如鹜，国民文化素质怎么能不陡降呢？

——昏乱。十九世纪初叶始，西方国家科学文明起了划时代的变革，而清朝统治者坚决闭目塞听，封关闭锁，形成朝野的“昏乱病”流行。例如，当鸦片战争即将爆发时，道光皇帝才问起：“英国地方在哪里？”被告之在中国之西，道光又问：“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又如，欧洲一国家使臣到广州拜访总督大臣请求通商，大臣竟说：“葡萄有牙，西班牙有牙……世界那来这么多国家，还不是夷鬼子捏造出来蒙惑我们的吗！”愚顽保守，麻木无知，对科学文明无缘，这种“昏乱病”是晚清的通病，致使国民文化素质低下，中国民族成为一个不长进的民族。鲁迅对此很愤然。他说：“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①

——虚患。虚患指那些空虚不实的空谈心性的学说和处世态度。这也是晚清士大夫轻以实事实功，呆板、因袭，缺乏创造性思想的表现。虚患使国人崇尚经典著作的死记硬背的能力和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华丽词藻的文章，处理时事务“虚”不务“实”。身居高官

①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

者处理国事，好为清谈。如慈禧的重臣李鸿藻，其周围结集一班名士，每一次外交屈辱事件，出来发言指责的很多，然其中多是“托攘夷美名，图不次峻擢”，将清议为终南捷径。于国家兴衰存亡无紧要。所以，有识之士就提出要革除传统文化造成的“虚患”，“寐患去而天日昌，虚幻去而风雷行。”^①

——卑怯。鲁迅曾形象地揭示了国民卑怯的特点：“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②因为经常受强者的蹂躏，蕴蓄着怨愤，然而不敢向强者反抗，转而欺凌更弱小者，这正是卑怯的表现。基于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表现——卑怯，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③

——瞒、骗。瞒和骗是自欺欺人的表现。对于人生的苦痛，现实的黑暗，社会的缺陷，没有正视的勇气，只得用瞒和骗来躲闪、回避。对于统治者的高压，思想的统制，没有抗争的勇气，只得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用瞒和骗来掩盖内心的不满，以堕落、懒惰来敷衍生活，以训良、知足来粉饰生活。鲁迅深恶嫉恨这种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瞒、骗”现象。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④

——好古。中国传统文化具“好古忽今”的特质。儒家的“四书”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以至于读书人共认半部《论语》可以走遍天下，半部《论语》可以治整天下。束缚于传统经学，使天然智慧的

① 魏源《海国图志·叙》。

②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③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④ 鲁迅《论睁了眼看》。

自由精神遭到窒息，归于死寂。清朝乾嘉始，国民文化素质低下表现出好古趋向越演越烈。当17世纪英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埋头于汉学的钻研，烦琐考证，从事无实研究，无视、冷漠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指引下，读圣人书，走圣人路，盲目自大，恪守传统文化，以古非今，厚古薄今，落伍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觉悟。

——做戏。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文中谈到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曾著的《中国人气质》书：“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足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鲁迅认为斯密斯所谈的中国人“做戏”的国民性格并非刻毒，他认为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表现就有“做戏”的毛病。他说：“相传为戏台上的好戏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①“做戏”既与“瞒和骗”相联系，就是做假，也与“马虎”相关，那就是那种随它怎么都不认真的态度。在整个中国视作一个大戏场的前提下，倘若有人认真，不做假、不马虎，那倒成了蠢物，不识世务，这种“悖理”现象，体现在国民文化素质之中，是何等的低下。

——散沙。晚清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举国一致的大合作，整个社会缺乏民族的生气，也就是缺乏民族团结。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其特质是离解性质的，人们除亲属纽带之外，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形如一盘散沙。作为“散沙”的体现，国民中很少有人视国事为已事者。在封建统治者的专制和愚民政策之下，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十分缺乏。中国人缺乏国

① 鲁迅《马上支日记》。

家观念主要源于他们对本乡本土有特殊感情的宗法思想，中国人缺乏公共观念主要源于奴才式的破坏心理。为自利，甚至不为自利而不惜破毁公物。鲁迅曾揭露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①互不信任，各为己利，无视国事和公共事业，这种“散沙”现象正是晚清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重要表现。

三、国民文化素质陡降的原因

清国没落后，国民文化素质陡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追本穷源，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皇权独尊，封建专制。清朝的封建统治，由皇帝一个人独裁（即使垂帘听政或摄政，也是由一个人说了算），由皇帝的个人意志和顺意性来统治整个中国。如果皇帝的禀赋不高，胸无大略（清朝多数皇帝如此），那么，他的意志和顺意性必将给中国带来一片混乱。即使个别皇帝禀赋甚高，胸存大略，也会由于个人的顺意性及武断，给中国带来一时的灾难。皇帝执政，独夫专权，都交替使用一整套的专制政术。梁启超将此术归结为四个字：驯、革、役、监。能驯则驯，“不能驯者，则从而革之，其有不受役者，则从而监之。举国之人，安有能免也？”^②一句话，皇权治中国，实质上是以国民（含执政的高级官员）的个性、思想受钳制为前提，也就是说，整个国民在皇权面前不能是人，或奴才，或“牛马”，如此而已。皇权独尊，促使国民文化素质的低下。

皇权独尊必然实行封建专制。清朝统治者依然是把儒家三纲学说作为中国社会特有的统治思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① 鲁迅《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②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